

论清代选本视域下的梅曾亮散文

陈虹虹¹

(1.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梅曾亮是“桐城派”古文大家, 道光十二年(1832)入赘为户部郎中, 自此寓居京师二十载, 一心为文, 奖掖后进。作为嘉道年间桐城派传衍的重要人物, 其影响可见一斑。重回历史现场进行探究, 选文作为极富当代属性的文学文献为此提供了切入视角。从选本视角考察梅曾亮散文, 彰显、遮蔽兼而有之, 桐城派选本与非桐城派选本呈现出显著差异, 探究其成因对更好还原梅文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及深入认识清代散文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代选本; 梅曾亮散文; 桐城派; 接受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6.1042

“桐城派”集中国古典散文之大成, 跨越古、近两个时代, 影响广泛、褒贬纷繁。虽古人鲜少使用“散文”概念, 然“散文”概念通行已久, 故本文所指“散文”乃狭义散文, 即古文。^[1]嘉道年间, 姚门弟子皆以传衍桐城统脉为己任, 梅曾亮更是潜心为文, 奖掖后进。于是“京师治古文者, 皆从梅氏问法”^[2]“四方人士以文字从其讲授及求碑版者至无虚日”^[3], 足见梅氏在桐城文脉延展中的重要作用。然此类论述大多出于对桐城门人交游之言的判断, 在当时梅文的接受面貌与梅氏的影响广度究竟如何, 还需回到历史语境进行探究。此前, 学界多聚焦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及梅氏所纂《古文词略》, 探讨梅氏创作风貌及辐射影响, 尚未涉及接受视域下的梅文选本研究。作为“桐城派”传衍中期的重要作家, 梅曾亮接受着“桐城派”内外视角的关注与评判。基于此, 笔者将以选家师事及选文宗旨作为桐城派选本与非桐城派选本的分类标准, 聚焦清代收录梅文的古文选本, 通过清人古文选本这一当世评价回溯梅文收录情况, 重回历史现场进一步了解作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面貌。“桐城派”影响广大, 考察梅曾亮散文收录情况不仅有助于解读时代对梅文的接受, 拓展梅曾亮研究的维度, 而且还能从中窥见嘉道年间桐城派的发展状态, 同时展现清代散文发展态势及文坛风气。本文拟就此略陈己见。

一、桐城派选本视野下的梅曾亮散文

梅曾亮散文在桐城选本中得到整体推崇, 篇目比重仅次于桐城中兴的代表人物曾国藩。选本编选者或选本参与者在凡例、选文篇数中或直接或间接皆对梅曾亮做出较高评价。兹略以清代散文选本刊刻年代为次论述。

(一) 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集》十三卷。道光二年(1822)一枝山房刻本, 现藏于天津图书馆。陈兆麒师事姚鼐受古文法, 序言曰:“本朝作者极盛, 究之能嗣熙甫者, 惟桐城方刘姚三家为得其宗。”是集以桐城标准选文, 选录顾炎武、毛际可、陈廷敬、汤来贺、冯景、方苞、刘大櫟、茅星来、姚鼐、吴定、方东树等数十人, 选文较多的作家依次是: 方苞(13篇)、姚鼐(13篇)、刘大櫟(11篇), 管同(10篇), 梅曾亮(6篇), 方东树(4篇)。而刘开、姚莹未入选。综合排名梅第五。陈选编纂于道光年间, 其时“桐城三祖”在门生弟子的追认下影响尤为广大; 管同与梅曾亮相交甚笃, 且年长于梅曾亮, 彼时创作影响高于梅氏。

(二) 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五卷。光绪六年(1880)刻本, 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本。杨彝珍“学文于梅曾亮, 尽得桐城古文义法”^[4]。是编以桐城派标准选文, 选录清初顾炎武至咸丰年间姚鼐等作者共77人, 选文400多篇, 其所录文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序, 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 方苞(19篇), 吴敏树(19篇), 潘诒(15篇), 胡天游(14篇), 姚鼐(14篇), 曾国藩(14篇), 梅曾亮(10篇), 魏禧(8篇), 刘大櫟(8篇), 朱琦(8篇)。综合来看, 各家所选篇幅相差无几, 综合排名梅第七。其序曰:“至于我朝初缀, 文家林立,

作者简介: 陈虹虹(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词学文献。

能深得八家所传之义法厥推方氏灵皋，降至中叶如胡氏稚威、姚氏姬传、汪氏容甫、潘氏少白、梅氏伯言，俱不出方氏下，其他通贤硕夫以是名家者又后先磊磊相望，及道咸之交兵事起，其时所号为能者恒出入锋镝间身多濒于危死，然治其术益精，直欲与中兴之事功争胜。”可见，杨选旨在梳理文脉，树立正宗，梅氏为清文传衍者之一。

(三)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光绪八年(1882)王氏虚受堂刊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收录此本。近人刘声木认为王先谦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中人，但其私淑桐城文学，极为推崇姚鼐，“古文以姚鼐宗旨为归”^[3]。对此，《续古文辞类纂序》有言：“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注本为三十八)人。”是选以桐城义法为选文标准。其中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梅曾亮(80篇)，曾国藩(81篇)，姚鼐(57篇)，吴敏树(42篇)，恽敬(28篇)，龙启瑞(26篇)，朱仕琇(18篇)，管同(16篇)，张惠言(7篇)，周树槐(5篇)。方东树选文1篇，刘开选文1篇，姚莹选文7篇。综合排名梅第一。

王先谦偏重梅文，原因有三：其一，王选《续纂》体例较大，故梅文选录篇目极多；其二，综观王氏选本，选家虽明确破除桐城门户之习，选录诸人仍多为桐城文人，侧面印证“桐城派”影响之大；其三，王先谦对梅曾亮尤为推崇，《续古文辞类纂序》曰：“道光末造，士多高于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足见王先谦对梅氏贡献之肯定。

(四)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二十八卷。光绪八年(1882)扫叶山房刻本，现藏于天津图书馆。黎庶昌师事曾国藩受古文法，恪守桐城义法。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选上编经子，中编史传，下编方苞、刘大槐前后文章，共选咸同年间古文449篇。其中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曾国藩(55篇)，姚鼐(33篇)，梅曾亮(18篇)，张惠言(14篇)，张裕钊(9篇)，吴敏树(8篇)，龚自珍(7篇)，郑珍(7篇)，朱彝尊(6篇)，戴名世(6篇)。管同选文1篇，方东树、刘开、姚莹未曾入选。综合排名梅第三。

从入选作家及篇目来看，梅文位列第三与黎庶昌“曾门四弟子”的身份立场不无关系。谢海林在《曾国藩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之关系关系发微》一文中详细梳理曾国藩与梅曾亮的交往及时常反复的态度，勾勒道咸年间桐城派真实境遇：梅曾亮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为“桐城三祖”所遮挡。

(五) 吴汝纶原编，李景濂补订《古文读本》二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北京河北书局铅印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本。该书共分为前、后两“篇”，于教授次第颇为措意。前“篇”选录先秦以至唐人作品，多为短篇，雅趣易读，后“篇”选入自宋及清人作品，由简短渐及深长，文体亦备。是书选文二百一十五篇，于唐宋以来，仅录“八大家”、归有光、“桐城三祖”、曾国藩、梅曾亮、张裕钊诸家，宗派之尚不言而喻。其中清代诸家收录情况：姚鼐7篇，方苞3篇，刘大槐2篇，曾国藩5篇，梅曾亮4篇，张裕钊3篇，管同、方东树、刘开、姚莹均未收录。

是编旨在教授之用，篇幅不多，崇尚明晰的情况下对桐城诸名家予以遴选。从桐城内部来看，梅曾亮归隐于朝，闭门读书，文学创作成就居姚门弟子之首，故予以收录。

(六) 寄古斋主人编《最近四大家古文钞》四卷。该书编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孟秋腾古斋印刷、直隶官书局发行本，依寄古斋主人原抄付印，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绍兴市图书馆。全书共四卷，每卷各系一人之作，分别为《梅伯言先生文钞》《曾文正公文钞》《张濂亭先生文钞》及《吴挚甫先生文钞》。诸卷作品大致以姚集《古文辞类纂》文体例先后列序，共收录作品一百七十余篇。其序曰：“自学堂兴而世竞言国文，顾求国文于古人，不如求之今人之义法易寻也。”目录后所镌题识又曰：“乃寄古斋主人所钞，以教其子弟”，可见选本存以近人之文为学子梯径之意。其中梅曾亮选文57篇，曾国藩41篇，张濂亭42篇，吴挚甫28篇。

是编虽自言为今人寻义法，而所选诸家皆桐城文人，实循桐城义法。寄古斋主人自序曰：“今人文莫著于梅曾张吴此四家者，皆入古最深而为文则各不相类，毗阴毗阳，随所性而嗜之，专精一家即入古之梯迳矣。”可见其对四人之推崇。对比收录篇目，梅文居首位，曾国藩次之，亦可见选家对梅曾亮擅声于前的认可，而曾国藩及其弟子乃倡导于后的践行者。

以上，桐城派选本皆以桐城义法为选文标准，面对影响广大的“桐城派”，即使极力反对文派之别的王先谦亦对梅文尤为推崇，^[4]其中“桐城三祖”的创始之功与深远影响不容忽视。欧明俊于《“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5]一文中表示，“桐城派”是在向前与向后的层累追认中逐步扩大影响的。处于影响范

围下的梅曾亮本身就带有姚门弟子的关注度，其为桐城选本所推重乃情理之中。

二、非桐城派选本视野下的梅曾亮散文

与梅曾亮在桐城派选本中受到整体推重不同，梅曾亮地位在非桐城选本中地位显著变化。王国维在论及清代学术流变时曾言：“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6]道咸以降，内忧外患的社会变局催促晚清知识分子做出改变，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及现实，“经世致用”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故此时期选家编选散文的意图发生了变化。此处所举隅非桐城派选本主要是“经世文编”系列选本及汇编式选本。概括而言，姚门弟子中梅曾亮居前二，整体地位低于曾国藩。具体情况如下：

（一）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例言有言：“兹编以皇朝奏议为主，搜辑诸家专集二百余种，最录历年所见公私文牒以附之，合海内著作之林，搜罗苦隘，较近人先事之续踵。”“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凡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目，各目别隶子目。所选文章皆以儒家义理为旨归的经世致用、关乎时事的文章。其中入选较多的作家依次是：姚莹（26篇），林则徐（17篇），龚自珍（14篇），梅曾亮（13篇），魏源（13篇），管同（12篇），冯桂芬（12篇），吴敏树（11篇），曾国藩（10篇），方东树（6篇）。刘开未有篇目选录。梅曾亮虽长期沉于下僚，入选篇目却多于曾一度权倾朝野的曾国藩，显见编者对其文之推重。

（二）葛士澐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书局石印本。同为经世文编系列，依照贺（长龄）编体例有所增改，凡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洋务九目，下列子目。是编部分桐城文人收录情况：曾国藩 63 篇，管同 10 篇，梅曾亮 6 篇，姚莹 4 篇，方东树 3 篇。梅曾亮地位显然不如曾国藩。西学冲击下，经世文编系列中“学术”纲目的地位逐渐降低，更注重“学”之实用性与时政相关性，葛编亦是如此。曾国藩一度权倾朝野，而梅氏多居闲职，对于时政等的书写曾国藩显然更为突出，也更受选家重视。

（三）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一百七十卷。光绪辛丑年（1902）秋月上海宝善斋石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清政府下令举行经济特科考试，邵氏应时而取《皇朝经世文编》、《续编》、《三编》诸文别择、补辑，“依经济八科以为之目，其无可专属者，以通论裨着二目，系之藪分瓜别绥绥有章都凡。”凡文教、地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通论及杂著十部。各部别隶子目。是编部分收录情况：曾国藩 8 篇，管同 5 篇，姚莹 2 篇，梅曾亮 1 篇。

邵编仅收梅文一篇，为诸选本之最少。考究之下：其一，邵编辑佚广博，各家收录篇目均不多；其二，梅氏虽继承桐城关心时事之传统，然长期沉于下僚、闭门读书，不以披露现实为突出，故不为选家所重。

（四）沈粹芬、黄人、王文濡《国朝文汇》二百卷。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共收录作者 1356 家，文章共 1 万余篇。自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陆世仪、孙奇逢诸家始，至近代的章炳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诸家。选文“独不取宗派之说，欲以备一代之典要而观其会通”（卷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卷首），实乃针对桐城派而言。是编多者有 15 人选文同录一卷，梅曾亮与邹鸣鹤、李棠阶、徐金镜、江沅四人同收入丙集卷二。具体收录：梅曾亮散文 25 篇，管同 7 篇、姚莹 6 篇、刘开 5 篇、方东树 2 篇，曾国藩 28 篇，魏源 22 篇，龚自珍 24 篇。就收录数量而言，梅曾亮仅次于曾国藩，多于包括姚鼐在内的桐城诸人。

郭绍虞言道：“有清一代的古文，前前后后殆无不与桐城生关系”^[7]，针对“桐城派”如此显著的影响力，沈粹芬等人所编辑的《国朝文汇》明确表示：“不立宗派用箴前人宗录一二家，或专举一派之陋。”“《古文辞类纂》则又拘于宗派，论者病之。”对于各种文体、各个文派不分轩輊，桐城派、汉学家、乃至新文体皆加以收录。是编旨在保存国粹、总结文章，梅曾亮一心为文由此进入选家视野。

以上，非桐城派选家不再局限于“一家之学”，转而将梅曾亮视为一般古文家进行选录，梅氏在此类选本中失去桐城内部的“优待地位”。此外，对该时期梅文选录的考察还应回归真实历史场景。彼时欧学东渐、危机渐重，知识分子著书立言大多意在反映现实，传承文脉及警醒世人。由此，包括梅曾亮在内的关注现实的桐城文人亦在选录之列，这也是晚清桐城派汇入经世思潮的重要表征。

综合而言，梅曾亮在清代散文选本中的地位值得认真审视，上述十种选本，编选宗旨、编排体例、文学好尚

各不相同,对梅文的收录情况也不尽相同。梅曾亮在杨彝珍《国朝古文正的》、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吴汝纶《古文读本》、沈粹芬《国朝文汇》等五种选本中的选文篇数均多于管同、方东树、姚莹诸人;在陈兆麒《国朝古文所见录》、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三种选本中的选文篇数少于管同;在诸多选本中的收文数量与曾国藩基本持平,唯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及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中曾国藩选文数目远多于梅曾亮。从选本类型来看,以桐城派标准选文的选本如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更加重视梅曾亮,而非桐城标准的选本如《皇朝经世文统编》《国朝文汇》等选本无明显偏重,而是将梅曾亮置于一般选家的地位。这种选本视野为考察梅曾亮古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然数字的差异仅为表象,须进一步追溯其深层原因方具说服力。

三、选本差异之原因考察

“选本是编纂者文学理念的具体化,既有助于文学观念的成熟、定型,也以一种更为直观而有效的方式促进文学观念的传播”。^[8]“桐城派”自方、姚起便有编纂散文选本构建与宣扬其文论主张的重要传统,且宗派意识强烈,排斥异己学派,大多桐城选本不选汉学家之作。陈兆麒、杨彝珍、王先谦等皆师法桐城。《国朝古文正的·凡例》云:“斯编端择高古深厚之文录之。其言性理、考据、官牍者不录,以有涉三者之文,便不入古。”“斯编于所录原文,有词近俚而伤繁者,间为芟薙之。然不敢窜改。”强调选文之雅洁、高古,遵循桐城文法。王先谦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桐城派中人,但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云:“惜抱《古文辞类纂》,开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九(注本为三十八)人。”亦以桐城义法为选文标准。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着意补姚选之不足,体例虽有出入,却仍贯彻“凡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有一不备者,文虽佳不入”的选文标准。吴汝纶乃晚清桐城派大师,其选本立场不言自明。简言之,上述桐城选本旨在通过选本的衡文定篇及价值判断,来彰显桐城一脉的文学主张,其对梅文之重视符合选文宗旨,维系并增强了派系传衍,也在层累之中扩大了梅曾亮的影响力。

其次,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国家民族危机日重,西学全面进入中国,晚清知识分子转而复兴经世之学。1826年贺长龄、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120卷问世,后形成“经世文编”之热。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例言》论及:“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典论》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是求文难乎,其选必执体格以绳之,则重文章不重行事传世,徒托空言,经世难期实际矣。”可见,“经世文编”编纂宗旨、纲目设置、衡文定篇等皆着意在保存国粹,经世致用。这一时期非桐城选本衡文定篇已无学派之别,而以儒家义理为旨归,兼顾考据与词章,旨在收录经世之文。

回归梅曾亮创作实践,柳春蕊在《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一文中论及姚门弟子大多官职低微,梅曾亮与姚莹是姚鼐弟子中功名较著者。然姚莹为文少裁剪、锤炼,时有琐碎、粗糙之病。^[9]刘开(1784-1824)和管同(1780-1831)年岁不永;方东树(1772-1851)一生皈依理学,其志不在古文。而梅曾亮出身诗书世家,曾在京居闲官20年,潜心文章,奖掖后进。对此,李详《论桐城派》有言:“同时好为古文者,群尊郅中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10]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一文更是详细钩沉梅曾亮秉承师志,于嘉道之际一心为文传播桐城文法的具体过程。^[11]由此,作为桐城中期的重要传衍人物,清代选家将其列入选本之中并予以一定程度的偏重与梅氏传衍之功互为补充。

表1 上述选本中收录梅文次数较多的篇目

篇目	《书杨氏婢》	《臣事论》	《石瑤臣传书后》	《总兵刘公清家传》	《黄个园传》	《闲园诗序》	《书庄子后》
收录次数	7	5	5	5	4	4	4

据表可知,清代选本多选梅氏论、传、书、序等实用性散文,内容多聚焦于现实民生、国事家事。事实上,“桐城派”并非仅流于追求雅洁高古之文,现实社会、时事民生亦在桐城文人的创作考量中,梅曾亮亦如此。其在《与朱丹木书》中写到:“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时。立吾言于此,虽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时朝野之风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见之。使为文于唐贞元、元和时,读者不知为贞元、元和人,不可也;为文于宋嘉祐、元祐时,读者不知为嘉祐、元祐人,不可也。”^[12]强调对现实的关注,即作为当下之学人应述当下之风俗。梅曾亮不仅以此为学术评价标准,其创作亦践行此道。如被选录次数最多的《书杨氏婢》,其将笔触转向下层人物,笔法

凝练且反映现实。梅曾亮以其创作实践践行桐城文法，关心现实，由此进入以经世为旨归的非桐城选家视野。

结语

综上所述，桐城选本对梅曾亮尤为推重，对其地位之彰显仅次于桐城三祖与曾国藩；非桐城选本对梅文则是有选择地收录，所选篇目意在“经世致用”。两者选录之差异，其一乃鉴于各自的选文立场。前者以桐城文法为主，故大量收录梅氏之文；后者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故着意梅氏经世之文。其二归于梅曾亮的创作实践。嘉道以来欧学东渐、内忧外患，桐城派尚处在发展“低谷”，梅曾亮虽沉于下寮仍专心为文，终桐城文统归于梅氏，地位与影响逐步扩大。故，梅曾亮在桐城选本与非桐城选本中的明显差异，既是桐城派与非桐城派论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晚清社会剧变在选本上的反映，折射出桐城派乃至整个清代散文发展态势。考察清代选本中梅曾亮散文收录情况对全面深入考察梅曾亮乃至整个“桐城派”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参见欧明俊.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J].文史哲,2011(04):107-120.
- [2]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26.
- [3] 刘声木撰,徐天祥点校.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卷七)[M].合肥:黄山书社,1989:243,253,333.
- [4] 王先谦在与萧穆信中说:“仆为《续纂》,既异乎姚氏所处之时,欲宽以收之,庶天下晓然于文果当理,皆出于同一,化其门户畛域之习,故于姚氏以后各家网罗遍及。”明确反对桐城门派之别。详见王先谦著,梅季校点.葵园四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6:846.
- [5] 参见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桐城派”界说之反思[J].安徽大学学报,2011,35(06):40-46.
- [6]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618.
- [7]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10.
- [8] 武海军.选本批评与桐城派文论构建[J].求是学刊,2016,43(01):127-132.
- [9] 柳春蕊.梅曾亮京师古文领袖地位成因考[J].云梦学刊,2008,29(01):108-111.
- [10] 俞樟华,胡吉省著.桐城派编年(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864.
- [11] 魏泉.梅曾亮的京师交友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J].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2004(10):221-267.
- [12] 梅曾亮著,彭国忠,胡晓明校点.柏枧山房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8.

A Study of Mei Zengliang's Prose through the Lens of Qing Dynasty Anthologies

Chen Honghong¹

¹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Mei Zengliang, a renowned essayist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in the Ministry of Revenue through financial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12th year of the Daoguang reign (1832), thereafter residing in the capital for two decades while devoting himself to literary composition and mentoring emerging scholars. As a pivotal figur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ongcheng School during the Jiaqing-Daoguang period, his intellectual influence remains noteworthy. This study employs anthology selections - literary texts imbued with contemporary attributes - as an investigative lens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contexts. The examination of Mei's prose through anthological perspectives reveals both intentional accentuations and omissions, with marked discrepancies emerging between compilations produced by Tongcheng adherents and non-affiliated editors. Investigating these editorial divergences proves essential for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reception of Mei's works and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prose evolut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Anthologies of the Qing Dynasty; Prose Works of Mei Zengliang; Tongcheng School; Reception Studies